

書介：
Charles Wm. Le Gendre,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Douglas L. Fix and John Shufelt eds.,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2012)

林欣宜*

一、*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之版本與史料價值

本書為李仙得（Charles Wm. Le Gendre, 1830-1899）於1875年所編纂的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的英文原稿，作者李仙得為法國裔美國人，曾參與美國南北戰爭，退伍後來到中國，擔任美國駐廈門領事，1871年赴日任明治政府顧問。中文文獻中除了「李仙得」外，也經常被譯為「李禮讓」或「李善得」。他在1867年至1875年間的諸多臺、美、日之間的外交事件中，扮演重要且活躍的角色，所留下來的見證記錄即為此書，中文名稱被譯為《臺灣紀行》，現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在成書近一個半世紀後，被重新排版編輯，並附上詳細而嚴謹的註解說明，年初正式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出版。

目前已知的《臺灣紀行》至少有英文及日文兩個版本。原書初稿於1874年9月李仙得編纂完成後，曾上呈給他在明治政府的上司大隈重信，並經其下令譯為日文，有十一冊的底本，存於日本國立公文書館，題名「李氏臺灣紀行」，1998年以照相影印的形式出版。¹初稿完成後，李仙得後來仍持續編輯此書，據編註者的考證，至少要到1875年8月才真正完稿。2005年，Robert Eskildsen從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英文原稿第三冊中摘錄部份收於其編輯之《外國冒險家與南臺灣的土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¹ 我部政男、栗原純編，《ル・ジャンドル臺灣紀行》，複刻版（東京：綠蔭書房，1998）。

著，1867-1874：1874年日本出征臺灣前後的西方文獻》（*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 1867-1874: western sources related to Japan's 1874 expedition to Taiwan*）（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頁69-196。但上述兩部已出版作品都沒有包含原附超過一百廿餘幅的豐富圖像資料。

近年來，透過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同仁的比對，發現在臺北二二八紀念館所存前美國駐臺副領事葛超智先生（George Kerr）捐贈資料中，有七卷微卷乃複製自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李仙得文書，目前國內似乎並無其他單位典藏，因此意者可以與《臺灣紀行》互相參照，應可對李仙得研究有不少助益，並免於往返海內外各機構查找史料之疲煩。

過去十多年以來，本書編者殫精竭慮收集世界各地不同版本的手稿，除重建此書手稿收藏之脈絡外，並將書稿文字、內附之珍貴照片、繪畫、地圖等加以比對、校正與互相補充，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完整的全校本。書中收錄了三篇編註者之導讀專文，並將手稿中所記載之臺灣地名製成表格，也製作了李仙得歷次臺灣旅行踏查路線的地圖，供讀者查找。此書之出版對瞭解十九世紀下半葉臺灣的涉外關係與東亞政治歷史有重要研究參考價值，亦可見將會在未來的臺灣史研究中佔有一席之地。

李仙得《臺灣紀行》的編註者是國內學界很熟悉的美國里德學院（Reed College）歷史系費德廉（Douglas Fix）教授與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的蘇約翰（John Shufelt）講師，他們除了對中文及中文文獻嫻熟、也了解臺灣歷史中種種相關議題外，兩位以英語為母語的研究者，更容易理解十九世紀末英語文獻的表達方式。他們藉由對《臺灣紀行》涉及之種種主題的深入探討，提供近年來清代臺灣歷史研究較為偏重社會文化、政府制度、區域發展、土地與開發等層面的另一種研究視角。

兩位編註者成功地在其名為導論，實為展現重要考證工夫的三篇介紹論文中，表現出他們排比、推敲的細心、對相關中、英、日語文獻的熟悉、對十九世紀末列強海外殖民議題的認識，甚至，為了理解李仙得及其時代，他們將研究的領域擴展至明治時期的日本政局與十九世紀末物質文化與技術進展的歷史，例如原住民物質文化、民族誌與照相技術及繪畫發展的歷史，對於讀者理解這批材料及其重要性有重大的幫助。

二、對清末臺灣涉外關係之研究價值

國內對於李仙得的認識，始於1867年美國商船羅發號（Rover）在屏東附近觸礁，船員登陸被殺害之中美外交交涉事件，後來更與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連在一起。此者在中文文獻中經常稱為「牡丹社事件」，在日本則稱為「臺灣事件」、「征臺之役」、「臺灣出兵」等，不只是近代東亞外交史中重要的課題，更影響了臺灣、琉球、朝鮮、日本與中國等周邊國家的命運。李仙得在十九世紀末東亞詭譎的政治情勢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促成了明治政府第一次對外的軍事行動，影響臺灣歷史發展甚鉅。²由後見之明看來，他為十九世紀末的日本植入擴張主義的種子，埋下了1895年臺灣納入日本殖民地的伏筆，但這樣重要的人物，在臺灣歷史研究中並沒有得到相應程度的重視。幸運的是，此本全校稿的出版，將可望改善此一情況。

據吳密察〈綜合評介有關「臺灣事件」（1871-74）的日文研究成果〉一文揭示，由於「牡丹社事件」或「臺灣事件」所牽涉地點並非只在臺灣南端，而起因也不僅是牡丹社原住民殺害琉球漁民而已，因此，自此事件受到研究者關注以來，有明顯地將「臺灣事件」視為日本近代外交史發展環節之一的傾向。正因為探究的重點放在列強在東亞政治角力的過程，也就愈加和臺灣本身如何肆應無關。當然，此一研究方向並不令人意外，就以現存的史料性質而言，較重要的中文出版資料有清季總理衙門之外交史料、清末重要人物書信文牘等，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的《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洋務運動文獻彙編》、《李文忠公全集》、《沈文肅公文集》及地方官的《甲戌公牘鈔存》外等，數量已相當可觀；日文材料方面，則因為日本在此事件中的積極主動立場，留下數量與類型更多的官私文書。由於較具關鍵性的歷史文獻主要集中在中日政府高層的公文書，研究清、日政府之作為對於牡丹社事件之後續處置及影響，自然成為討論之重心，也就更加脫離地方歷史的層次。

迄今為止，中文相關出版材料又已增加不少，如：

1. 王學新譯，《風港營所雜記》（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
2. 黃得峰、王學新譯，《處蕃提要》（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
3. 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

² 牡丹社事件指1871年12月日本琉球宮古島及八重山島民漂流到臺灣東南部八瑤灣附近，船上人員被生番殺害，生存者最後返抵琉球的事件。事隔兩年，日本於1874年4月以蕃地所屬未定的口實出兵臺灣南部，後續處置飽受國際關注，不管中日雙方，當時的文獻都頗為可觀。見吳密察，〈綜合評介有關「臺灣事件」（1871-74）的日文研究成果〉，收入同氏著《臺灣近代史研究》（臺北：稻鄉，1990），頁219-282。

沙故事》(臺北:如果出版社,2006)。

- 4.愛德華·豪士(Edward House)著;陳政三譯著,《征臺紀事:牡丹社事件始末》(臺北:臺灣書房,2008)。
- 5.杜德橋編;謝世忠、劉瑞超譯,《1880年代南臺灣的原住民族:南岬燈塔駐守員喬治·泰勒撰述文集》(臺北:原民會、順益博物館出版:南天發行,2010)。

直接相關的綜合性論著則有:

- 1.藤井志津枝,《日本軍國主義的原型——剖析1871-74年臺灣事件》(臺北:著者出版,1983)。
- 2.戴寶村,《帝國的人侵:牡丹社事件》(臺北:自立報系出版社,1993)。
- 3.蔡光慧,《排灣原住民部落社會的建立與族群關係(1630-189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
- 4.周玉翎,《臺灣南端尾閩恆春的族群與歷史(1867-1904)》,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 5.高加馨,《牡丹社群的歷史與文化軌跡-從臺灣族人的視點》,國立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 6.林呈蓉,〈1874年日本的「征臺之役」——以從軍紀錄為中心〉,收錄於《臺灣風物》53:1(2003.3)。
- 7.林呈蓉,《牡丹社事件的真相》(臺北:博揚文化,2006)。

上述略列書目或仍有不夠詳盡之處,然而,明顯的是,將近二十年來,除了原已有外文史料之編譯問世外,臺灣學界僅有極少數史學相關與對臺灣南端恆春半島的人類學與民族誌相關研究出版。此一主題或相關領域的研究未見相應的成長,或許是由於語言的隔閡,或許由於十九世紀末與臺灣歷史發展相關的外國人多為「殖民侵略者」,帶著「帝國主義」擴張心態或宣揚宗教霸權而來,在這樣的脈絡下,諸如李仙得的研究是否能為清末的臺灣歷史帶來其他與臺灣之社會與族群、政治等等層面更為密切相關的探討與詮釋,將是一大考驗。雖然如此,編註者的三篇導論專文:“Textual Introduction”(文本介紹)、“Photographic Views in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臺灣紀行》中的攝影影像)與“Kobayashi Eitaku’s Paintings in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臺灣紀行》中的小林永濯繪畫),為十九世紀末臺灣研究的新方向做了下列二點示範:

1. 對清代臺灣歷史研究的啟發

蘇約翰在〈Textual Introduction〉（文本介紹）一文對李仙得生平及其《臺灣紀行》成書的前因後果之爬梳，讓者清楚明白李仙德、《臺灣紀行》一書與日軍侵臺一事的直接關聯，他並透過追索李仙得與明治政府中的副島種臣、大隈重信、大久保利通之間的關係、以及明治政府高層內部征韓派與內治派之間鬥爭的結果，如何影響侵略臺灣方案的成形與執行。他將李仙得獻策一事，置於其個人意志、職業生涯及明治初期日本內部政治角力的種種轉變中來討論，有助於讀者理解李仙得身為明治政府的外國人顧問，切中某些明治高層官員在西方衝擊的危機意識下以對外擴張來轉移內部不安心態一事，或許有助於研究史中經常單方面地以擴張或帝國主義來解釋日本出兵的本質，而能更深入行動背後的動機。

為處置日軍侵臺後續，欽差大臣沈葆楨（1820-1879）於1874年來臺辦理善後事宜。辦防、設府置縣及開山撫番開啟了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的臺灣新局，一改以往「消極治臺」的統治基調，企圖消彌番地歸屬的疑慮，以防再成為外國侵略之口實，恆春半島尤其為新政施行之重點。李仙得於本書中留下其屢次來臺見聞之文字與影像等一手材料，其中有不少為對臺灣南部恆春半島當地地理、地質環境、以及原住民描述的描述與圖像資料。在當代想以口述訪問來補充牡丹社事件的內容已不容易的狀況下，³與原住民頭目卓杞篤的交手，更是在中文材料中罕見的記錄，可與1874年以後的地方發展互為對照。但這些珍貴的材料只是深入了解當地複雜族群關係的起點，從較整體地域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清政府新政對當地的影響、當地原住民內部社會複雜的聯盟及權力關係消長、以及原住民與漢人，特別是與粵人的關係，甚至，1895年日本殖民臺灣之後，此一地區後續發展的研究，都還大有可為。

2. 圖像資料利用之可能性

李仙得於1867至1872年間多次來臺，收集了大量臺灣資料，也有照片、繪畫、地圖等，費德廉“Photographic Views in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臺灣紀行》中的攝影影像）一文強調李仙得對於各類型的影像資料非常重視，在透過為數不多的線索中，推敲出李仙得書中多張照片拍攝時的情境，並強調其基於構圖與觀賞經驗的考量下扮演的「導演」角色，亦即，對於全書來說，圖像不只是裝飾或綴美，李仙得視這些圖像資料為支撐其論述的主要角色。

³ 譚昌國，〈歷史書寫、主體性與權力：對排灣族人寫排灣族歷史的觀察與反思〉，《臺大文史哲學報》59（2003），頁75。作者文中以「如何書寫排灣族歷史」為小題，講述了幾位以原住民身份與角度出發的書寫，可以視為建構「歷史記憶」的一部份。作者也指出了對於排灣族原住民的歷史研究與人類學研究缺乏對話的狀態非常明顯。見同文，頁86-88。

李仙得所收集與臺灣相關的照片、地圖、繪畫等等，可以說集十九世紀七〇年代所有關於臺灣影像資料之大成，有志利用者可以藉此進行文本以外的新媒體研究，可能帶來令人耳目一新的價值與意義。舉例而言，Robert Eskildsen以當時報紙刊登的傳統版畫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和一般研究者經常利用官方檔案為主的研究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據其指出，1874年日本出兵刺激了明治時代日本人對臺灣島的興趣，隨之而來帶動了以新聞錦繪報導從臺灣戰場來的聳動新聞的需求。⁴費德廉在第三篇導論“Kobayashi Eitaku’s Paintings in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臺灣紀行》中的小林永濯繪畫）中，便藉由追索李仙得刻意收錄與照片及一般繪畫風格迥異的浮世繪風格新聞錦繪及對其聘用日本畫師小林永濯之生平及合作過程的探討，突破了只能將研究停留於1874年的臺灣出兵是為了懲罰臺灣生番以及佔領番地的傳統視野，而得以拓展至與一般庶民更加相關的亞洲繪畫與攝影發展初期的歷史、及新媒體的消費及其市場的討論。

三、十九世紀末西洋人之臺灣認識

對於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臺灣史研究而言，李仙得一書可以建構出西洋人的臺灣認識的一個重要面相。以李仙得為代表的歐美人士對臺灣及其住民的認識，固然建立在明顯的種族中心、帝國主義優越心態、以及文明教化的使命上，但諷刺的是，他們卻也是留下最多十九世紀末與臺灣及其住民一般日常生活相關的第一手史料者，他們對臺灣市鎮的觀察、臺灣經濟狀況的描述，特別是原住民民族誌資料或風景、人物照片、繪畫與地圖，都是以官方文書為主的中文資料裡極為少見的珍貴材料。正如同李仙得扮演了促成日本出兵的角色，其書稿不只是他個人對臺灣的認識而已，更是明治初期的日本以及其他歐美列強理解臺灣現狀的重要依據，從而引領了牡丹社事件前後至1895年甲午戰爭之間的日本擴張論的發酵。在理解其心態的前提下，研究者對十九世紀末外國人在臺灣歷史中扮演的角色的詮釋，可以更積極、大膽。

只要略加翻閱包括費德廉教授等人對十九世紀在臺外國人的研究，⁵我們不

⁴ Robert Eskildsen, “Of civilization an savages: The mimetic imperialism of Japan’s 1874 expedition to Taiwa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 no.2 (2002): 388-418.

⁵ 例如，費德廉（Douglas Fix），“‘A highly cultivated country’: Charles Le Gendre’s mappings of western Taiwan, 1869-1870,” 《臺灣史研究》18：3（2011.9）：1-45；John Shufelt, “Imaging Formosa: Victorian writings on Taiwan, 1860-189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2010；胡家瑜，〈馬偕收藏與臺灣原住民印象〉，《馬偕博士收藏臺灣原住民文物——沈寂百年的海外遺珍》（臺北：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2001），頁66-74。

難發現，這些外國人士並非各自單打獨鬥，細繹其交遊網絡，不難整理出十九世紀末在臺灣的西洋人之間的聯繫關係，並探究其整體的意識型態與臺灣認識。如同蘇約翰所言，李仙得透過《臺灣紀行》所傳播的臺灣認識是以一種無所不包的「百科全書」式的方式問世的，然而，透過本書編註者小心排比書稿內容與之前已發布之文章及官方報告後，發現更合適描述《臺灣紀行》的文類其實是「檔案彙整」，此一發現意蘊以編者個人經驗提醒讀者必須小心探究十九世紀末外國人編纂者的真意。

自臺灣開港後至1895年之間，大量外國人來到臺灣，從第一代外國人士如英國鳥類學家郇和（Robert Swinhoe）、陶德（John Dodd）等；到第二代的李仙得與豪士（Edward House）、美國自然學家史迪爾（Joseph Steere）、馬雅各醫生（Dr. James Maxwell）、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必麒麟（W. A. Pickering）、禮密臣（J.W. Davidson）、攝影師湯普生（John Thomson）、Lee Khong Tek、西尼（S. Sidney）、愛德華茲（St. Julian Hugh Edwards, 1838-1903）、甚至日本畫師小林永濯，都可以被歸入這個網絡之中。他們為世界得以認識臺灣做出貢獻，而持續探究十九世紀末在臺外國人之臺灣認識，對臺灣歷史發展所造成的衝擊，將可預見是臺灣史研究下一步的重點。

